

庄子内篇新解
庄子通疏证

王孝鱼

岳麓书社

庄子内篇新解
庄子通疏证

王孝鱼

岳麓书社

一九八三年·长沙

庄子内篇新解 庄子通疏证

王孝鱼

责任编辑：边仲仁

岳麓书社出版（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1983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167,000 印张：7.375 印数：1——13,000

统一书号：11285·17 定价：1.00元

出版说明

《庄子内篇新解》是今人山西王孝鱼研究我国古代哲学的著作之一。现根据他在一九八〇年逝世前手定的标点本校印出版。

此书内容，除引申王船山《庄子解》、《庄子通》两书的观点外，并发挥了王氏自己的研究心得。它与传统的《庄子》诠释迥异其趣，而对《庄子》书中个别文句和句读，也作了某些具有创见的调整。

王氏在此书的前言中，提到他所写的《庄子通疏证》，有与《内篇新解》相得益彰之处。为了满足读者的要求，我们也将该书同时排印，合为一本，以便相互印证。这对保存作者数十年悉心研究庄子思想和船山学术的成果，都较有积极的作用。

目 次

前言.....(1)

《庄子内篇》新解

《逍遥游》新解.....(11)

《齐物论》新解.....(28)

《养生主》新解.....(61)

《人间世》新解.....(68)

《德充符》新解.....(93)

《大宗师》新解.....(112)

《应帝王》新解.....(145)

《庄子通》疏证

《逍遥游》疏证.....(161)

《齐物论》疏证.....(169)

《养生主》疏证.....(184)

《人间世》疏证.....(192)

《德充符》疏证.....(200)

《大宗师》疏证.....(208)

《应帝王》疏证.....(220)

前 言

战国时期，新兴的封建制度已在各国战胜了奴隶制度，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而一切旧观念旧思想都也随着大大地动摇起来，涌现出前所未有的内部分化蜕变现象，于是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各家都要适应新的形势，解决新的问题。其中主要的是儒、道、墨三家。儒、墨两家此处姑且不谈，道家也有了分化，兴起了所谓黄老之学，思想内容与前者纯粹的老聃之学具有了不同的精神面貌，代表人物即是庄周。

从现存的战国诸子看来，对于后代思想影响最大的，儒家中是孟子，道家中是庄子。孟、庄二人大约是同时的人物，二人都受时代的影响不小，都是在与当时的其他思想家们互相争辩中发展起自己的思想来的。孟子此处不谈。庄子，则主要是与他的唯一好友惠施争议讨论，在谁都想战胜谁的斗争中，建立起自己的思想体系的，于是产生了《庄子》一书的内七篇。

关于《庄子》的内七篇，多少年来即有人发生怀疑，以为七篇文章，组织严密，自成系统，与外、杂篇性质迥异，并且七篇篇名，整整齐齐，都以三字组成：《逍遥游》，《齐物论》，《养生主》，《人间世》，《德充符》，《大宗师》，最后殿以《应帝王》，更觉新奇触目。实则如果明白了内七篇乃是庄子专门为惠施而作，苦心孤诣地细心经营而写出来的一部专著，也就没有什么奇怪可言了。一部专著，当然要组织严密，自成系统。以庄子那样的文学天才，什么新名词新形式不会自由创造出来呢？

王船山先生对《庄子》有深刻的研究，他的《庄子解》一书，在《天下》篇的前言中就曾说：“或因惠施而有内七篇之作。”他虽用了一个“或”字，不敢作十分肯定之词，但是启发性却很大。我以先生的这一观点来细读内七篇，再参以《天下》篇末附论惠施的若干文字，实觉内七篇就是专为惠施而作，无可怀疑。既然产生了这种认识，因而乘兴写出了这一小本《庄子内篇新解》或者也可以说是替先生这一观点作一点补充说明吧！

《天下》篇末，论述了庄子的思想面貌以后，本应结束，但是忽然附加了介绍惠施学术的一大段文字。现在我们研究惠施，主要的材料根据即在其中：惠施“历物之意”的十个命题而外，还旁及了惠施与辩者相应所持的廿一事，以及惠施“遍为万物说”的一点大致内容。更可注意的是，这一大段介绍文字，处处寄寓着深厚的惋惜之情，除了知己好友是不会这样的。文中说：“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其道舛驳，其言也不中”；又说：“惠施日以其知与人之辩，特与天下之辩者为怪”；又说：“惠施之口谈，自以为最贤，曰天地其壮乎！”还紧跟着一句作者的评语，“存雄而无术”。此下又描写南方的一位奇人黄缭，“问惠施以天地所以不坠不陷，以及风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辞而应，不虑而对，遍为万物说，说而不休，多而无已，犹以为寡，益之以怪，以反人为实，而欲以胜人为名，是以与众不适也。”于是又加了几句总结性的评语：“惠施弱于德，强于物，其途隩矣？”又说：“由天地之道，观惠施之能，其犹一蚊一虻之劳者也，其于物也何庸！”又说：“惠施不能以此自宁，散于万物而不厌，卒以善辩为名。惜乎惠施之才，骀荡而不约，逐万物而不反，是穷响以声，形与影竞走也，悲夫！”

从这些评语中，我们可知，惠施逐于万物，散于万物，强

知于物，以天地为壮观，大有研究的价值，因而他“遍为万物说”对于天何以不坠，地何以不陷，以及风雨雷霆之故，都敢于加以解释说明。这种偏重于物，追求物理的精神，在我们古人中实在是难能可贵。如果发展下去，或可与西方的希腊比美。然而可惜自他死后，一蹶不振，后继无人，就连他的万物说也内容失传了。惠施的十个命题，文前冠以“历物之意”四字，可能就是在万物说的基础上，把其中各种精意加以综合判断而写出的一篇科学性论文，可惜命题虽存，而其证明的步骤，因其怪而被删去不存了。

能认识到惠施重物、察物的这种精神的，据我个人所知，似乎只有章太炎先生。太炎在他《国故论衡》的《明见》篇中说，九流百家皆言道，而“言心莫眇于孙卿，言因莫远于庄周，言物莫微于惠施。”他居然以惠施与庄周、荀卿鼎峙而三。然而庄周所反对的，就是惠施的这一可贵的重物、察物而说理微妙的精神，难道不是庄周的一大罪过吗？

庄周之所以如此反对惠施的原因很简单。他所代表的是那时的没落贵族。他是宋国人，公元前二八六年，宋为齐所灭，可能庄周是亲眼看到的，或者这就是他不曾到过齐国稷下讲学的一个原因。他因为无所依托，自觉前途无望，失去了为人的信心，于是产生了失败主义情绪，人间世的一切对他都失去鼓舞之力，兴趣毫无，自甘于贫困寂寞之中，轻易不愿同人们来往。然而他不单文学天才极高，对于外界事物的感应很敏，而且又富于哲思，对于外界事物的观察和体验很能入微，因而便在当时从右边发展了老子的客观唯心主义，走入了主观唯心主义和相对主义的精神世界，借以安慰他个人的思想苦闷。他的唯一好友惠施，彼时恰以偏重于物著称，谈论不休，与他争辩，

见面就提出问题，相互口角，当然对他来说，不能不是一种很大的刺激作用。惠施讥评庄子为大而无用，不近人情；庄周讥评惠施为逐物丧己，重知劳神；他既说服不了惠施皈依庄门，于是只有运用他的文学与哲思的天才，撰著了一部发抒他个人情思与思想的专著，留作纪念，这就是现在我们所读到的《庄子》内七篇。

《庄子》杂篇的《徐无鬼》篇曾载：庄子送葬，过惠子之墓，顾谓从者曰：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蝇翼，使匠石斲之，匠石运斤成风，听而斲之，尽堊而鼻不伤，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闻之，召匠石，曰：“试为寡人为之。匠石曰：‘臣则尝能斲之。虽然，臣之质死久矣’。”庄子述说了这一则故事后，才郑重地说：“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与言之矣！”足见二人交谊之厚。生前二人谈学，大概是旗鼓相当，都能认清问题的要害所在，各持己见，互不相下，所以惠施一死，庄子便感十分孤寂，无与他真正讨论之人了。看他以匠石自居，而把惠施比做郢人，郢人可以“立不失容”，匠石可以“尽堊而鼻不伤”，当然匠石的运斤与郢人的站立，不会时间太为短暂，那么庄子与惠施的相互谈辩问题也不会内容相当简单，一次两次就可以结束。内篇的七篇大文，大概就是为了留念惠施可以立不失容的胆识，同时也为了夸示自己可以运斤成风的才华的。

《庄子》一书，惠施在其中，的确占据一个极重要的位置，除了记载庄子送葬，感念惠施而外，其他各篇关于二人的记载和问答，亦颇不少，内篇《逍遥游》中载有惠子与庄子问答两则，《齐物论》中虽未显载二人的直接问答，但是其中引论惠施，攻击惠施的地方很多，显然惠施是篇中的中心人物。《养生主》中亦未明提惠施，但言外所指，只能是惠施，不会是他人。《人间

世》篇并未明提惠施，而大力宣扬的是孔子与颜回的所谓“心斋”之教。“心斋”之教，宗旨是在指明用知要避免沾滞于物，这就无异于假借孔、颜之学来帮助自己，或可易于纠正惠施逐于万物而不反的过失。至于为什么庄子要利用儒家来教训惠施，大概是因惠施颇为尊重儒家的原故。《寓言》篇载：“庄子谓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时所见，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谓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以下庄子仍用孔子之言，反驳惠子的所谓勤志服知。由此可见，庄子认为，惠施虽然是名辩之士，但其内心是相当尊视儒家孔子的，所以在《人间世》篇，庄子不惜大量引述了颜回与孔子的言论来感化惠子。关于这一问题，《应帝王新解》中还要谈及，此处姑略。《德充符》篇忽又突出惠施，可与《逍遥游》篇相互辉映。《逍遥游》中惠施讥评庄子之言“大而无用”，《德充符》中惠施讥评庄子主张人固无情。这两篇中二人的问答都很激烈，针锋相对，剑拔弩张。由《逍遥游》而引起了《齐物论》，由《德充符》而引起了《大宗师》，其前后承接的过脉关系，极为显豁，无异于明告于人：《齐物论》与《大宗师》两篇最重要的论文，都是惠施逼得庄子写出来的，除了和盘托出自己的整个思想，又有什么办法来对付我的这位诤友呢？以此来说，我们现在能读到《庄子内篇》这一部组织严密，自成系统的哲学专著，其中包括着《齐物论》与《大宗师》两篇亘古奇文，不能不感谢一下惠施。

内七篇的最后一篇是《应帝王》。这一篇名，乍看颇为奇怪，但是如果明白一点惠施的政治生活，也属平常，不必多疑。惠施曾作过魏惠王的宰相，时间很久。《吕氏春秋·淫辞》篇说：“惠子为魏惠王为法，为法已成，民人皆善之，献之惠王，惠王亦善之。”《吕氏春秋·不屈》篇说：“惠王谓惠子曰：上世有国，

必贤者也。今寡人实不若先生，愿得传国。”由这两段记载，可以见出惠子当时名誉之高，似乎应居帝王之位。或者《应帝王》三字名篇，就是庄子故作狡狴，以此来讥讽惠施。《秋水》篇载惠子相梁，庄子往见，惠施误信人言，说庄子之来是想取代自己相位，于是大搜国中三日夜；最后遭到了庄子的当面斥责，批评他不过如同鸱鸟得了一只腐鼠，即来吓那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的鹍雏，实在可耻可笑之至。恐怕《应帝王》篇就是庄子基于这一心理而特为教训惠施的作品。庄子在这一篇中，不过是针对惠施治天下的主张，提出他反对的意见而已。篇末最后一段，浑沌被凿，七日而死的寓言，亦只是用以讥讽惠施的过于穿凿用智，不但不足以治天下，反而要召致危亡。惠施相魏之时，赶上魏国邯郸之役，后又大败于齐，即历史上著名的马陵之战。魏惠王经此挫折，无法应付，惠施便又劝他暂时朝齐，缓和国际情势。《战国策》又载有魏派惠施往楚，劝楚与秦讲和，又载惠施使赵，请求伐齐存燕。看来此时的惠施颇带有一点纵横家的色彩了。《应帝王》篇对他的那些教训，不能说事出无因。惠施最后，遭到了张仪的离间，易衣变冠，冒了许多危险，才逃出了魏国，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这还不够是浑沌被凿而死的一幅写照吗？

除上述庄子与惠施的问答以外，散见于其他篇中的也还不少。《秋水》篇又载有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一则问答故事，《至乐》篇载有庄子妻死，惠子往吊，一则问答故事，《徐无鬼》篇在庄子送葬过惠子之墓之前，又载有庄子、惠子问答一则故事，庄子居然谈到儒、墨、杨、秉四（秉为公孙龙字，见《列子》释文），与夫子为五，讨论起孰是孰非的问题，可见惠施在庄子思想中，是占有一个重要地位的。《外物》篇也有关于惠子谓庄子“子言

无用”的一则问答，我在《新解》中已移到《逍遥游》篇去了。无论如何，合观全部《庄子》，惠施与庄子的友谊极不寻常，可以概见，那么庄子为惠施而作出内七篇大文，又有什么可以奇怪的呢！我个人以为，如果把内七篇认做庄子为惠施而作，则不但内七篇的各种小问题可以自然解决，就是《天下》篇末在庄子以后忽然附上论惠施一大段文字，也可以同样解决。记得早年曾读一部明人的评本《庄子》，其中所引徐文长的评语，就有一条提出过《齐物论》是庄子专为惠施而作的论点。文长也曾解过《庄子》，至少内篇，可惜多方搜购，终未获见其书，至今还是一宗遗憾。但是从此也可见出，《庄子》为惠施而作的论点，并不能认为是纯出个人武断，穿凿附会。

但是既名《新解》当然与旧注旧解迥异其趣，尤其是关于二人思想对立方面的问题。一方是惠施，专受批判；一方是庄子，专门批判人。凡是诸如此类的问题，船山的《庄子解》中，只要可以用作疏通证明的，无不尽量援引，同时也可说明，个人对于庄子思想的评价，基本上是采用船山见解。不过《庄子解》究竟是解《庄》注《庄》的书，其批判之意只寓于隐约微晦之间，不很显著，所以想彻底了解船山对于庄子的批判，就得依据他的《庄子通》。《庄子通》一书写于一六七九年，这时船山已六十周岁，哲学思想更为成熟了，书名叫做《庄子通》，就是要批判庄子思想的不通之处，通庄子之所未通，自成一家之言。现在将该书的内七篇特作了疏证，附录于《新解》之后，相辅而行，以便彼此互为印证。《庄子内篇新解》的重点是，庄子在批判惠施的同时，介绍他自己的全部反动思想；《庄子通疏证》的重点是，船山在批判庄子的同时，介绍他自己的若干进步思想。这两部小书正好相得而益彰，盐梅而和羹，既可以真正理解庄子，

又可以更深入地理解船山。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是我国在本世纪末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最重要的短短二十年，而八十年代就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头十年，是否能把基础搞好，全看这十年。本人年已八十周岁，还好遇着开展这头十年工作的决定性时刻，在我们中国哲学史这一战线里，能顺利地抓住《庄子内篇》与《庄子通》这两部相当重要的著作为个人工作的中心，这与本所同志们的热诚赞助与鼓舞有密切的关系，谨致以最衷心的感谢。

王孝鱼识于太原

一九八〇年四月

《莊子內篇》新解

《逍遥游》新解

【题解】郭象《注》说：“小大虽殊，放于自得之场则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分，逍遥一也，岂容胜负于其间哉？”陆德明《音义》说：“《逍遥游》者，义取闲放不拘，怡适自得。”船山《庄子解》则说：“道者向于消也，过而忘也；遥者引而远也，不局于心知之灵也；故物论可齐，生主可养，形可忘而德充，世可入而害远，帝王可应而天下治，皆脗合于大宗以忘生死，无不可游也，无非游也。”船山对于逍遥二字分别解释，颇有针对惠施立言之意。过而不忘，沾恋势位；局于个人心知，争胜好名，正是惠施的缺点。他以《逍遥游》一篇贯穿了七篇大旨，更为特识。如果说《逍遥游》是庄子为惠施而作，那么七篇也不为例外，因为七篇是完整严密的一部书，不应割裂开来，分别对待。

【原文】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

【新解】惠施历物的十个命题，其中之二说：“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惠施运用逻辑思维方法，如同后世几何学原理似的，认为平面没有体积，所以无厚可言而不可积；又因他震惊于天地的有形之大，但自己局度狭小，所以说面积之大，只会说大可千里。庄子则思想极度放达，有形的天地不足以限制于他，因而思想方法也不屑探索于追求一事一物的根源之中，于是在开始的一则寓言笔下，便借机来讥讽惠施。“鲲之大不知其几千

里”，似乎意即指出，如果放大眼光，宏观宇宙的话，鲲鱼之大，不知该有几个千里那么大，惠施只会说“其大千里”，器量未免太小了。

【原文】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几千里也。

【新解】以庄子看来，惠施的又一缺点就是执一而不化，所以此处特意提出一个化字。化者变化，神妙难测，鲲鱼居然可以变化成鹏鸟。既然变化难测，就不是普通逻辑思想所能了解的了。变化就能大上加大，所以单单鹏鸟的大背就不知该有几个千里那么大，不用说全身。

【原文】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

【新解】上文提出一个化字，此处又提出一个怒字。庄子之意是在指出，变化的道理，看清好了，不可认真对待，如因化而更大，惹起自己无谓的情感，无端而怒，以大自矜，便难以神志凝静，成为大器了。如这一大鹏，怒气一动就要起飞，而一飞就得展翼，大翼一展，其大如天边的一面云，更非几千里所能计算，难道不是自寻烦恼吗？以船山逍遥二字的解释来说，大鹏的怒而飞，还不够真正的逍遥游，所以他在《庄子解》中说：“此游于大者也，遥也而未能逍也，”也就是说，还是局于心知之灵，表面虽可引而远之，实则仍不能一切忘怀，有所局限。

【原文】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新解】大鹏既怒而飞，不能凝静，于是乘着大海自然运动的机会，就想迁居南海，换一个新地方。大鹏以为，从北海飞到南海，志趣够远大的了，而不知以庄子看来，南海或北海，不过是天池而已，又有什么可自矜的呢？